

#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民族政策之比较

潘 华<sup>1</sup> 勾霄丹<sup>2</sup>

(1.黑龙江黑河学院 2.黑河一中 黑龙江 黑河 164300)

【内容摘要】通过对国共两党抗战时期民族政策的分析,分析出两党民族政策的差异,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能够最终夺取全国政权是有着深厚的基础的。

【关键词】国共两党 民族政策 异同

中图分类号 D6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04-0116-03

六十年前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中取得的第一次辉煌的胜利。中华民族用几千万优秀儿女的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壮丽悲歌,从而最终换来了民族的独立和彻底的解放。永志不忘这段光荣的历史会使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永远铭记“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坚定誓言,永远铭记为了民族的解放而做出了不朽贡献的志士仁人。当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时,不能不提到在共同的岁月中为反抗民族共同的敌人而携手而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国民党人。本文试就两党在抗战时期的民族政策入手,分析两党政策的异同,以求从一个侧面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历史最终选择了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成为了中国的主人这一历史结局。

## 一、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民族政策的核心点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积极投身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斗争之时,为争取全民族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在诸多方面都作了细致的准备。提出了一系列适合国情的民族政策,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统一战线成为全民族合力抗战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也成为领导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回顾中国共产党这一历史时期的民族政策,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科学分析中国少数民族实际,并提出相应的指导方针。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面临以下几类矛盾:一是各少数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日本全面侵华后,不仅沿海各地先后被占领,而且日本还将侵略的触角伸到了力所能及的少数民族地区,如中国东北和内蒙古等地,使少数民族被占领区的人们生活状况急剧恶化,也就使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阶级矛盾转化为中日两大民族间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二是各少数民族与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虽

坚持抗战,但在对待各少数民族政策上仍未采取强有力的团结政策,使原已固有的少数民族与国民政府间的矛盾未有根本的改观。三是少数民族内部上下层间的矛盾,在原有的阶级压迫未有改变的情况下,又有极少数少数民族上层卖身投敌,从而更加深了民族内部矛盾。四是少数民族间相互的矛盾。受历史和社会原因制约,以及当政者恶意为之,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民族间的相互矛盾,既有汉族和其他民族矛盾,也有其他民族间相互敌视与隔阂。这些矛盾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战期间民族政策时必须考虑的。

在分析了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之后,中共正确指出少数民族命运是与全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连的,只有从全民族解放中才能争取到少数民族自身的解放。为此,在中共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明确指出:“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sup>[1](P328)</sup>。“现时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政策,首先和基本的应当是团结抗日”<sup>[2](P682)</sup>。这些基本方针成为了中共制定这一时期民族政策基本出发点。

在上述方针和原则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采取切实措施,开展了有声有色的民族工作。

第一,坚持主张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并将其作为中共民族政策基本着眼点。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在江西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就提出过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一大上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文献中就明确规定,少数民族可以“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到抗战时期,随着抗战规模不断延伸,在理论上,中共的民族区域自治理论更加完备。在党的六届全会上,全面阐述了民族区域自治主要内容,承认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平等权,主张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平等基础上“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在民族杂居地省、县政府“需设置由当地

\* 作者简介:潘华(1967-),女,黑河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勾霄丹(1976-),女,黑河一中教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和他们有关的事务，调节各族间的关系”等等。到了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又强调：“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同年11月6日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认为全中华民族当前的紧急任务，是“团结中华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彝、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

第二，在实践上，中共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得到了具体实施。1940年4月和7月，先后由党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并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的两个文件，即《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中都强调中国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在平等原则之下共同抗日，并实现建立统一联合的三民主义的新共和国”。1941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强调，应当“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这一时期，边区政府先后在盐池县、新正县和陇东的回民聚居区建立了几个民族自治乡，从而将中共的民族理论化作实践。

第三，制定了一系列尊重少数民族，保护其利益的切实措施。中共在少数民族政策上始终强调，“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sup>[3]</sup>。在此基础上，保障少数民族拥有参政权，保证他们能选出自己满意的代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选举条例曾为此专门做出了具体规定，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如发还过去被军阀强占的土地归他们自己管理，没有土地耕种者可以领取公地或公荒地，并可依法取得土地所有权，对于无以维持生活的少数民族同胞，予以特殊之救济等等<sup>[1][P734, 675]</sup>。“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同时，还要“发扬他们过去优良的传统，在各方面认真的帮助少数民族的进步”。根据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根据地“容许各派宗教存在”。“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sup>[2][P695, 605, 743]</sup>“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使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性与歧视性的言语、文字、与行动”<sup>[1][P620]</sup>。

正是在这些正确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与各少数民族一道表现出高度的抗日积极性和空前的民族凝聚力，共同抵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取得了全民抗战的最后胜利。

## 二、中国国民党抗战时期民族政策的核心

毋庸讳言，中国国民党掌控下的国民政府在整个抗战时期继续行使着对国家的统治权。因此，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国抗战，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和民族政策诸多领域，都作了较为细致全面的准备。

从某种意义上说，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民族政策是孙中山民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的延伸。孙中山在其创立的三民

主义思想中，把民族主义放在了首位，其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建立独立的统一的多民族的民主国家；第二是承认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团结，开发民族地区。总的来讲，国民党抗战时期的民族政策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基本吻合的，但因时代、环境变迁，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有关少数民族问题的阐释更为详尽。1941年3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教间之融洽团结，以达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目的之施政纲领案》，详细规定，要实行民族自治，任用各民族地方人士；要帮助民族地方发展经济，开辟交通，要发展边疆教育，增设学校，编译民族语文等。仅就主张的民族政策内容而言，比孙中山时期的做法更为详尽、也更具体。

第二，在宣布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共同参政建国”的口号下，在团结全民族抗日旗号下，又不愿承认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存在。蒋介石在其《中国之命运》的小册子中认为中国只有宗族，而没有民族。如果只有宗族而没有民族，事实上民族平等就无从谈起，他认为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只是同一个“宗族”的大小分支。在该思想支配下，必然会导致在各民族地区继续推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诸如在广西以“改良风俗”为名，成立了“改良风俗委员会”，对居住在那里的侗族等少数民族采取强制同化政策，迫使这些少数民族“一律改用汉服”，改变原有的民族风俗。其他地方少数民族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歧视和压迫，使各地区的少数民族中的许多人不肯在公开场合承认其少数民族身份。国民党政府还在少数民族地区沿袭历代王朝的“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的政策，在西北利用当地军阀实行统治，在西南、东南多用各族土司、头人、政教首领实行统治，在北方，以设行省为名，以政治和地域上分割少数民族，造成民族隔离和一地两主局面，还多方拉拢蒙古王公贵族，对他们采取收买政策，对宗教上层也同样委以党政要职。

第三，国民党在法律上承诺保障少数民族的各项民权利，可在大敌当前，民族生存面临危亡之际，仍然在实际推行的是白色恐怖政策。除公开的警察、司法机关以外，还建立了许多特务组织，各族群众稍有冒犯，就有受到秘密的、非法的逮捕、暗杀的可能。对少数民族的反抗，国民党政权实行残酷镇压政策，蒋介石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相当严重。周恩来曾指出：“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在名义上，他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在行动上，也实行民族的歧视和压迫”。蒋介石政权关于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的立法或宣传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第四，客观上作了一些有利于抗战和团结少数民族的事。如坚持维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办教育。据统计，国民政府教育部直辖的边疆学校，有小学22所，中学2所，师范学校16所。虽然数量非常之少，但毕竟办了一些学校，为少数民族培养了一些人才，对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进步，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 三、国共两党民族政策的异同点

国共两党在大敌当前之际，为了维护共同的民族利益，反对民族的敌人，尽管两党政见不同，也经历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但毕竟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因而他们的内外政策

必然既具有相一致、相互协调之处,同时,多年的政治纷争,也必然导致政策上体现出诸多的差异,在民族政策上也不例外。

从相同之处来看,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国民党,都认识到了抗日战争是一场包含了全体少数民族在内的全民族反抗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因而都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动员全民族力量投身伟大抗战的理论和措施。这些理论和措施得以执行保证了抗战时期全民族的空前团结,其结果是没有出现国民政府整体对日的投降的灾难性后果。

但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两党的民族政策更多的表现出差异性,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抗战胜利后最终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国国民党左右了中国政局的发展,并夺取全国的政权。

第一,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更趋具体化。1938年9月29日到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对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作了详细论述。纠正了当时一部分人中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与行动。

第二,中共提出了新形势下新的民族观。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总结到:(1)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2)各少数民族有悠久的历史,虽则发展程度不同,但都对祖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3)中华各民族都有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光荣历史传统,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不赞成互相压迫。这些重大理论的提出,极大丰富了中共在抗战时期对民族问题重要性的认识。

第三,设立专门民族机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1939年初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十分注重少数民族工作,用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作指导,系统研究少数民族问题,开展民族工作。1940年4月,西北工作委员会拟订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7月拟定了《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

提纲》。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全面系统地对两个民族历史、中共对其政策、现存各种矛盾进行研究,提出抗战中对两个民族的政策原则及具体措施。这两个文件成为中共指导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中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sup>[2](P678)]</sup>。这一原则的提出,及其后在边区政府管辖范围内建立“回民自治区”、“蒙民自治区”的实践,为中共最终用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做出了有益尝试,积累了经验。在此基础上,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提出中共在民族问题上的具体纲领,即“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sup>[2](P742)]</sup>,全面阐述了中共民族政策的主张,其核心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情况相结合,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其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民族平等、团结、自治、发展。平等是根本原则和总政策;自治是基本形式和基本政策;共同发展是根本宗旨和现实目标。

从以上诸方面可以看出,国民党的民族政策与中共相比,内容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狭隘、片面,无系统的理论阐释和现实的具体事件。反之,中共的民族政策理论阐释完备,有具体实践,将政策的原则性和实践的灵活性有机结合,突出了中国特色,从此侧面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能够最终战胜中国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决非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结局。

参考文献:

-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卷)[M].
- [2]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

(上接第115页)存在者。‘无’既不自行出现,也不依傍着它仿佛附着于其上的那个存在者出现。‘无’是使存在者作为存在者对人的此在启示出来所以可能的力量。‘无’并不是在有存在者之后才提供出来的相对概念,而是原始地属于本质本身。在存在者的存在中‘无’之‘不’就发生作用。”<sup>[8]</sup>这也就是说,“无”是存在者的自我敞开、自我显现的性质与能力。这一过程对于我们了解郭象“独化”论的哲学意义,具有非常大的启导作用。

参考文献:

- [1]丁原明.从原始道家到黄老学的逻辑发展[J].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3):37-38.
- [2]丁原明.黄老学论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29.

- [3]王博.序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4.
- [4][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A].王弼集校释[M].中华书局,1999:10.
- [5][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老子指略[A].王弼集校释[M].中华书局,1999:195.
- [6]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6.
- [7][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三十五,列传第五)[M].中华书局,1974:1045.
- [8][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是什么[A].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M].上海:三联书店,1996:146.